

这是一本用文学样式讲述上海租界历史的书，也是长篇历史报告文学，全书差不多涵盖了上海整整一百年的历史，图文并茂，可看性强，其中有许多作者多年搜集并珍藏的图片。本书以历史为坐标，用文学的笔触、文化的视角来写上海，故事精彩，史料充实，颇有新意，读来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。

陆其国／著

畸形的繁荣

租界时期的上海



东方出版中心

陆其国 / 著

畸形的繁荣

租界时期的上海

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畸形的繁荣：租界时期的上海 / 陆其国著. —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2009.8

ISBN 978-7-5473-0039-8

I. 畸… II. 陆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5175 号

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90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：187 千字

印 张：7.625

版 次：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039-8

定 价：20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序

施宣圆

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，是陆其国先生的修订本。早在本世纪之初，其国就在百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，八年过去了，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最近，他同意东方出版中心的建议，重新出版修订本。修订本对部分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，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。尤其是书中的老照片由原来的翻拍改为扫描，十分清晰。但对原来的观点和行文风格，没有更动。这是一本图文并茂、生动活泼的上海租界史读物。

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一书，讲了上海租界的诸多故事。近代的上海是中国的一把钥匙。自从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殖民主义者轰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上海随之沦为租界。何谓租界？按照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签订的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所谓租界，就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划定一块地皮，租赁给外国人寄居，其地的领土主权、管辖权、行政权、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。但是，在以后由于殖民主义者的豪夺巧取，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这块土地竟成为中国政府权力难于鞭及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外国人设有类似于议会的“外人纳税会”，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、立法权、司法权；有巡捕、军队和监狱，俨然成为“国中之国”。所以，在以往的书中，一提到租界，都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，在租界里的洋人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。租界，是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

不言而喻，租界是中国的耻辱。中国人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作为历史研究，如何全面地、客观地评价租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在“双百”方针的指引下，上海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“热点”，成为一门“显学”，有人称之为“上海学”。有关研究上海史的机构日益增多，不仅上海有，香港、台湾有，日本、美国等国家也有。出版的著作，以上海而言，“大部头”的有唐振常主编的《上海史》，张仲礼主编的《近代上海城市研究》等，这是属于通论性的；通史性的有熊月之主编的十五卷本的《上海通史》；还有大型的工具书，十大册的《上海通志》和三大册的《上海大辞典》等等。至于其他的以上海为题材的图书更是五花八门，不计其数。我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上海研究中心的委托，与一些朋友主编一本《上海七百年》（2000年又出修订本）和《大上海》、《上海谭》两套丛书。以上所有关于上海史的各类图书，都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到上海租界。

对上海租界最有研究的应推唐振常先生和熊月之先生。早在80年代中期，熊月之先生就在《文汇报》“学林”专刊发表《略论上海租界的双重性》，文中指出，租界在中国存在将近一个世纪，对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诸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。这种影响是复杂的，不是单一的，有消极的一面，也有积极的一面。客观地指出“租界”有“双重性”。当时，“左”的思想尚存，此文发表后，反响强烈。我作为编辑，接到不少来信来电。反对者有之，赞成者有之。但经过一段时间，慢慢地平静了，学术界人士基本认同对“租界”应该一分为二，既要看到它的黑暗面，又要看到它的光明面。

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一书，则以独特的视角，另辟蹊径，以报告文学的形式，写了上海租界的种种故事。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只要看一看书名和目录，就会觉得这是一本很有特色、很有魅力的有关上海租界的读物。其国是一位作家，又是一位学者。作

家善于形象思维，注重文采，讲究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。学者则注重抽象思维，讲究史实，结构严谨，史论结合。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既有作家的风格，又有学者的特色。我一向反对所谓“戏说”历史，因为它不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，胡编乱造，甚至歪曲、糟蹋历史，误导观众和读者。作家写史要在历史事实的前提下，不能违背历史背景，不能随意改变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，以及人物的身份和性格。本书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。其国读了许多有关上海史的书，注意史实的准确性，几乎做到言必有据。一方面指出租界的出现和存在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明，另一方面，它又在很大程度上渲染着当代的世界文明，带来了许多先进的事物。

我认识其国已经三十多年。他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，留下终身腿疾，正规大学向他关门，他选择了电视大学。在“电大”，他孜孜以求，勤奋攻读，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更激发起他的兴趣。80年代末，他从企业调入上海市档案局，担任杂志编辑。他早先的写作以文学作品为主，在《文汇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和《萌芽》、《电视电影文学》、《上海小说》、《星火》、《雨花》等报刊，经常有他的中篇或短篇。有些作品被转载或得奖。朋友们称他是一颗文学“新星”。后来，他的写作偏重于历史文化题材。在他看来，要写好历史文化题材的作品，就要多读书，勤思考。他从小就对文史产生兴趣，酷爱读书，买书成为他的一种嗜好。他写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，常常挑灯夜战；他淡泊名利，烟酒不沾，与书为伴，喜与读书人为友。在他的那间书房里，书橱中、桌椅上，到处都是书。他藏书有上万册，其中有历史文献、档案资料、史料笔记；有旧报刊、地方志书、各种老照片，其中不乏珍本、善本。书，是他写作的养料；书，是他的生命。爱书、藏书、读书、写书，其国以此为乐，乐在其中。其国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，没有高级职称的头衔。其实，正规大学的文凭，高级职称的

头衔是重要的,但不是最重要的,要紧的是一个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。其国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。这几年来,他潜心写作,成果累累,已出版了《风起大漠——敦煌纪事》、《千年不败——中山陵纪事》等长篇历史报告文学,以及历史文化随笔集《老上海迷人风情》等,并在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、《解放日报》“朝花”、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发表了一系列历史文化随笔,创作态度严谨,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与学术价值。

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有关上海租界的读物,是上海史研究园地中的一朵奇葩。因此,我乐于为其作序。

2009年5月中旬于沪西法华镇路“圆明园”书斋

自序

陆其国

这本有关上海近代历史叙事与思考的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问世之际，躬逢阳光灿烂的 21 世纪欣然到来。这样的巧合，对本书作者来说，深以为是一种荣幸。

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是一本用文学文本讲述上海租界历史的书；从体例上说，它也许更接近于长篇历史报告文学。全书差不多涵盖了上海整整 100 年的历史。100 年的时间落差，固然可以消解许多岁月形成的隔膜，但曾经凝于其间的生命中的悸动和焦虑、萎靡和飞扬、压抑和激愤的历史印迹是无法切割的。一旦想到这一点，即使今日伫立在纵歌欢畅、逸兴遄飞的黄浦江畔，我心里依然会陡生一种茕茕孑立的苍凉感。有几次，当我的思绪从对租界时期的上海的钩沉梳理中回到现实，看着眼前如织的游人神情悠闲、怡然自得地从身边走过时，我往往会更真切地体味到一个集骄傲与屈辱、繁荣与畸形于一身的上海的沉吟，觉得从中传达出了黄浦江从昔日摇曳的芦苇丛发出的喁喁私语，到今天看着高楼林立所流露出的旷世感慨。

也许，正因为我心里有着这样的情结，所以，当 2000 年初夏，百家出版社姜逸青先生和丁翔华女士向我约稿，希望我能写一本讲述租界时期的上海历史的书稿时，我几乎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了下来。姜先生和丁女士告诉我，必须要以历史为坐标，用文学的笔触、

文化的视角来写作这本书，因为写上海的书此前已出了不少，再出就一定要有新意。

我得承认，这样的要求正契合我的心思。我隐隐有一种预感，以这样的叙事手法写作这本讲述上海租界历史的书，即使新意不以多寡论，至少也不乏探索价值。而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说，再也没有比探索着更使人激动更使人兴奋了。用简练雅俗的文字，演绎错综复杂的历史（尤其是租界时期的上海历史），但愿它的可看性对有兴趣认知上海的昨天的读者，会有所帮助。

当然，我一点也不否认写作这本书是对自我的挑战。但是毕竟文学我所爱，历史亦我所爱。1992年和1994年我在《解放日报》上连载的两部以中国近代史为背景的中篇小说《偷看战争》与《愤怒的睡狮》，可以说即喻示着鱼与熊掌我欲兼得。只是近年来，我似乎已更钟情于历史纪实文学与历史文化随笔的写作，这样的写作过程，除了文学根底以外，很大程度上还仰赖于写作人对史书和史料的解读和甄别、天长日久的点点滴滴的积累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发的思想。多年来，当我以一颗甘耐寂寞之心孜孜不倦如此做着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这实际上已于不经意间，给我今天写作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这本书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

一星期过后，我先拿出了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一书的内容提要和写作提纲。很快获得了通过。接着，出版社要求我先写出一个章节，这一章写出后也很快得到认可。

这时候，我的情绪已完全沉浸在了租界时期的上海历史氛围中。

在夏日燠热的空气下，在不到九平方米的书房中，拥着一台电脑，伴着上万册藏书，我在100年间的昔日租界上海作了一次既艰苦又愉快的精神漫游。当这个夏季快要过去时，书稿也终于完成了。我这才得以抬起手，轻轻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长长地吁出口气。

感谢这个难忘的夏季，我在这个夏季里伏案艰辛思考和挥洒劳作的汗水，夏季则用《畸形的繁荣——租界时期的上海》一书慷慨赠我以难忘的收获。为此，我也要感谢姜逸青先生和丁翔华女士，因为他们，才使我在一跨入 21 世纪，即欣悦地有了这样一份收获的机会。

当然，我也要感谢那些我在写作本书时，所参阅的一些著作的作者和学人，以及那些为本书增色不少的大量老照片的蒐集者及拍摄者，尤其是前者，本书写作有不少地方援用了他们的成果，关于这，我已在不影响全书体例风格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地在行文中作出标示。

在此，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郭瑜。我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写出这本书，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她对我的全力支持，使我在家里得以心无二想地沉浸于写作之中。

诚然，我不想掩饰在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中，有可能出现的谬笔和有待补正完善之处。即使就上海租界时期的史事论，限于篇幅和体例，本书也不可能做到“一体关照”，所以对于有些史事，我就只能以图照昭示一二，比如“四明公所事件”、“救助犹太难民”等等，其中的疏漏之处，也就在所难免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都将万分珍惜和感谢任何针对本书的批评匡正，因为我深信，这样的慷慨赠予，一定会使我得益匪浅。

2001 年元旦于上海

目 录

序	1
自序	5
第一章 钟 情	1
第二章 启 端	12
第三章 胜 败	26
第四章 表 象	38
第五章 故 伎	51
第六章 比 照	70
第七章 黑 幕	83
第八章 诞 生	96
第九章 硝 烟	107
第十章 传 播	121
第十一章 颠 覆	136
第十二章 崩 坍	147
第十三章 前 景	160
第十四章 血 性	173
第十五章 屈 服	200
第十六章 还 地	216
重版后记	227

第一章 钟 情
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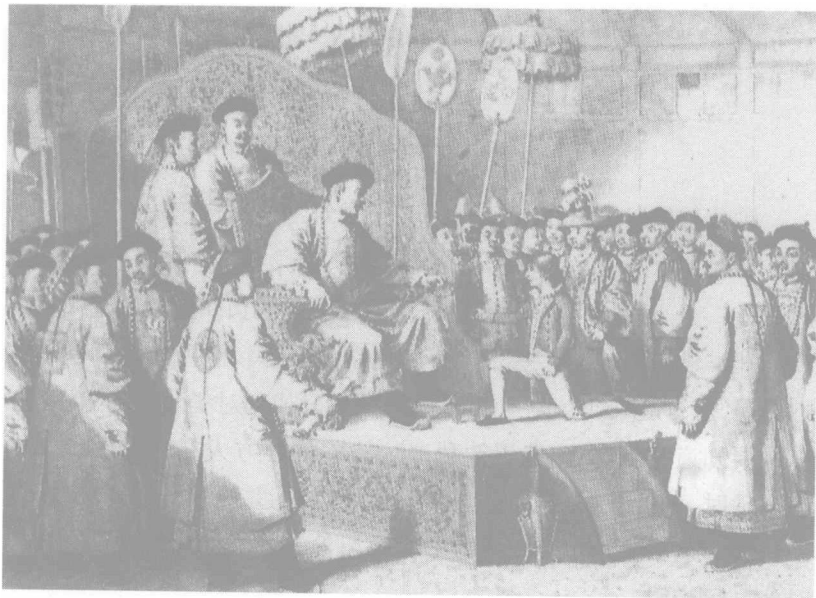
钟情总是有缘由的,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,乃至对事,这应该是通识。正因为想到这一点,我不由心生诧异,诧异于还在 240 多年前,即清乾隆二十一年(1756 年),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弗里德利奇·毕谷就已郑重建议英国政府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。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,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,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。

要知道,当这个叫弗里德利奇·毕谷的西方人充满自信地说出这番话时,他还没有到过上海。一个没有到过上海的异国人,却能一语中的道出上海未来的趋势,这种超凡预见,确实有理由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。

那么,弗里德利奇·毕谷钟情上海的缘由何在呢?

如果细加考察,我们还是不难找到其中的端倪。比如,弗里德利奇·毕谷曾受公司派遣,负责处理公司在广州港的商业事宜,并另辟新的通商口岸;而且他还先后管理过“奥古斯塔”号和“玛丽公主”号两条船,在乾隆二十年(1755 年)前后到过广州、宁波。在此过程中,弗里德利奇·毕谷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商人。正是通过与这些上海商人的交往,弗里德利奇·毕谷对上海有了一定的认知。

然而,不知是由于弗里德利奇·毕谷所提建议本身有缺陷,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,总之,英国政府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甚至在弗里德利奇·毕谷提出这一建议后,整整过去了30年,依然缺少憬悟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,英国政府为达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,特派遣卡斯卡特来中国谈判。此番来华,卡斯卡特还怀揣一项政府指令:“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,在确定地点时,应特别注意……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——大约北纬 $27^{\circ}\sim 30^{\circ}$ 之间。”



1793年英使谒见乾隆皇帝

读到这项英国政府的指令内容,我特地找出世界地图查了一下,结果发现,北纬 $27^{\circ}\sim 30^{\circ}$ 范围内有宁波、舟山,却不包括上海,位于北纬 30° 北面的上海,没有留住英国执政者的视线。

卡斯卡特后来死于来华途中,中国之行可谓半途而废。又过了6年,清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,英国政府又派遣特使来华,这个人就是到了中国后,中国皇帝坚决要他行跪见礼才肯接见,而他则坚

持不愿,因而引起一番争执的那位马戛尔尼爵士。此人是代表英王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,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硕士,也是位外交家。与他同行的公使斯当东,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、牛津大学法学博士,他曾经还获得过另一所大学的医学硕士学位。关于此番出使,他后来写出了洋洋四五十万言的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一书,详尽地描述了此次中华之行的经过。但即使是这次马氏来华,也还是要求增辟宁波、舟山、天津为通商口岸,并希望得到邻近珠山(即舟山)的小岛屿,或是靠近广州的某处地方,以供英国商人居住。这表明,37年前弗里德利奇·毕谷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进取上海的建议,根本没有激起回响。至此,可以说,弗里德利奇·毕谷对上海的钟情,在时间上,大大领先于英国政府。

但尽管这样,从马氏所提要求中,却透露出了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要求在他国开口通商、设立租界的思想萌芽。只是这一段时间,英国政府在外交上可谓迭遭败绩——

先是马戛尔尼的要求遭到清政府严词驳斥:“天朝尺土俱归版籍,疆界森然,即岛屿沙洲,亦必划界分疆,各有专属。况外夷向化天朝,交易货物者,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,若别国纷纷效尤,恳请赏给地方,居住买卖之人,岂能各应所求?”

接着,嘉庆二十一年(1816年),英国政府再次派遣阿美士德来华谈判,谋求建立与清王朝间的直接政府关系。阿美士德做梦也没有想到,他此行的结果比马戛尔尼还要惨,傲慢的中国皇帝不仅不欢迎他,甚至都懒得见他一面,还要他快点离开北京。

在此,我们已不难看到,英国政府几次三番要求在中国增辟口岸,却没有一次提到上海。

2

道光十二年(1832年)的一天,随着船长礼士一声命令:“起锚!”

悠长的汽笛声顿时在海边荡响。随即，停泊在码头边的一艘叫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的巡洋舰，徐徐离开了澳门。当船长礼士趾高气扬发出开船令时，船上七十多名水手中，很少有人知道此番远航真正指挥着这条巡洋舰的，并不是他们的船长，而是一个叫林赛的英国人。因为这次远航，除商务外，还负有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勘探、寻求新的通商地点的重任。应该说，作为政府行为，英国对上海这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的钟情，正是在这时候开始进入序幕的。

年仅 30 岁的林赛踌躇满志，那时他已是东印度公司一名高级职员。站在甲板上，望着眼前的茫茫大海，他充满自信地既像对自己，又像对站在身边的一个人说：“这次我们决不会空手而回。”为了不至于空手而回，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：胡夏米。

“我们”是个复数，林赛说“我们”，自然包括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副手。副手叫郭士立，是个中国通。此行他充任翻译及随船医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 1831 年，郭士立曾有过一次乘坐中国商船从天津到广州的航行经历，并在那年的 8 月 20 日在上海有过短暂停留。就是那次的短暂停留，上海一下子激活了郭士立的“灵感”，以至使他对上海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，他看到了上海的地理位置与贸易发达的重要性，并认为上海是清政府最重要的商业城市。他的分析和判断，比起弗里德利奇·毕谷对上海的预感，深刻了许多。

东印度公司很看重这次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巡洋舰远航，为了更有利于行使它的间谍使命，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甚至破例不装载一箱鸦片，也就是说，宁愿放弃走私鸦片所能带来的巨额利润，也要确保这次任务的完成。在此附带提一笔，林赛同时也是一名鸦片贩子。

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进入中国海域后的可疑行迹，很快引起了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怀疑。未几，接到报告的清政府下令，各地严禁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入境，并不准与之贸易。

此时，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巡洋舰已经抵达长江口外。对这一片水域而言，第一次出现了欧洲舰船的影子。

中国方面的敌视，林赛很快就从几位中国渔民身上感觉到了。那天长江口外正好有一艘渔船经过，林赛命令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靠上去后，郭士立立刻朝渔船上正在作业的中国渔民大声喊话，说只要他们为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引航，他们将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。

渔船上一位满脸皱纹的老渔民竖着耳朵，总算听清了郭士立的话。于是就见他抬起头高声问道：“你们来干什么呀，我们请你们来了吗？”老渔民话音刚落，一旁的几个渔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笑声激怒了林赛。“给我击沉它！”只见林赛像发疯一样叫道。渔民们听到林赛的喊声，这才意识到处境的危险，于是马上调转船头，赶紧朝吴淞口方向驶去。

看到渔船匆忙逃离，林赛和郭士立顿时相顾而笑。原来他们正是要利用这艘渔船在前面引航，将他们带进上海。就这样，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巡洋舰的诡计得逞了。

6月20日凌晨，“阿美士德勋爵”号巡洋舰在边尾随着中国渔船、边测量航道中，抵达吴淞口。接着，林赛和郭士立换乘上小艇，不顾吴淞炮台和中国兵船开炮警告，强行闯入了黄浦江。之后这艘强盗小艇犹如一条幽灵，沿着黄浦江水域，一路向上游驶去，中途几经停留，最后于黄昏时分，在小东门外的天后宫靠了岸。

当然，小艇一路进入，也并非毫无阻挡，比如在蕴藻浜，他们就曾遭到清政府派船堵截，严令立刻离开上海。只是这样的严令，根本不会让林赛当一回事，他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反过来警告阻拦他的官员：“我此行是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，误了事你担待得起吗？”说罢，林赛狞笑着，命令小艇继续强行朝黄浦江深入。

3

有一点林赛说的是实情，那就是他要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。从天后宫上岸，林赛来到熙来攘往的上海县城，接着他继续采

取强行闯入的方法，相继面见了上海知县和上海道台。见面后，前者拒绝一切交谈，只是一味强行将事先已准备好的所谓“紧急公文”递交后者过目。

究竟是什么公文，要如此急切地让清政府属下的上海官员阅读呢？

不知是上海官员的视力不好，还是阅读水准有限，总之，他们阅读得很慢。也好，那就让我们顺着他们的目光，索性也来看看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紧急公文吧——

“英吉利国船主胡夏米谨稟苏松太兵备道大人，转报上宪。现在大英国船已至此，并进口欲买卖。船装载洋布、大呢、羽毛等货。旧时大清与大英国贸易微少；但此百年间增加 10 倍，因此两国彼此获大益。向来每年小船七八只至贵国，如今每年大船七八十只到中国，带本国的货物来，买运贵国的茶叶 3 000 万斤及湖丝等货，银几百万圆。又，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，年年进我大英国属地方之埠头，受好款待。无奈其买卖大为赚钱。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，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，而希冀贸易于中国北方之埠头沿岸。倘贵国的商，买我本国的货，我们买贵省的茶叶湖丝等货，则两下均受益。又加国之饷，增民之生活计。商贾皆欲藏于县之市，又添两大国友道结交之义。此是彼此至重之事，是以我恭稟大人俯念以此事情，转报上宪；如可始创，贵省与本国生意始虽少微，亟添甚大，而开大利路于将来矣。稟赴大人台前，万望施行。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。”

这份性质显属通商宣言的文本，将自己说得很委曲，此番前来欲求通商，是鉴于“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，年年进我大英属地方之埠头，受好款待”。不仅如此，你们来英国做买卖还“……大为赚钱。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，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……”言下之意不言而喻：你们也要给我们好款待，让我们也有赚钱的机会。

我们注意到，这份别出心裁的要求通商的文本，对罪恶的鸦片